

引言

COVID-19使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各类专业人士和公民对证据产生百年一遇的关注。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挑战，人们对证据的需求前所未有。在非常紧迫的时间内，通过提供最佳证据满足需求，人们做出了巨大努力。当然，这一切并非顺利。一些决策者故意忽视最佳证据，另一些决策者则在传播错误和虚假的信息。正如我们在第4.13节中所描述，除了最佳证据，还依赖许多其他方面，而且某些形式的证据比其他证据更被依赖。正如我们在第4.6节中所描述的，全球最佳证据综合存在主题覆盖不均、质量参差不齐和未进行更新的情况，以及由于缺乏合作而造成的巨大研究浪费。但是COVID-19证据响应的许多部分确实进展顺利，正如我们在第4.7节（动态证据产品）和第4.12节的最后一列（例如，快速多国家随机对照试验和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供快速符合实际的证据支持）中所描述。

其他社会挑战，如从教育成就到卫生系统绩效再到气候变化，也同样需要重新关注最佳证据。新冠疫情更清楚地揭露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挑战，例如风险暴露和缓解风险方法的不平等。其他暂时被搁置的“逐渐崭露头角”挑战，现在需要被重新考虑。此外，我们还认识到需要更好地准备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危机，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的突发卫生事件。

现在是时候将如何顺利使用证据进行系统化，完善诸多不足之处。这意味着创造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机遇和动机，(1)并建立结构和流程以维持它们。现在也应平衡使用证据与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2)对于那些寻求使用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的人来说，需要赢得并积极维护合法性。成立全球应对社会挑战的证据委员会是为了支持人们开展这项重要工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两次分别授予了两个三人组的经济学家，他们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即所需的证据。在COVID-19大流行爆发前不到半年，该奖项颁给了三位使用随机对照试验进行有效性评估的经济学家。在大流行爆发一年半后，该奖项颁给了三位使用自然实验进行有效性评估的经济学家。作为支持决策者使用证据的人所需要保持谦逊的一个案例，正如经济学家Esther Duflo曾说：

“我最大的财富之一……是我一开始没有太多个人意见。我只有一个观点，即人应该对事物进行评价，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我从来没有对评价结果不满意。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我不喜欢的结果。” (3)

评价只是我们在本报告中讨论的证据形式之一。我们在本报告中使用的“证据”一词是指研究证据。正如Esther Duflo这类研究人员会开展研究，决策者可以使用由此产生的证据。理想情况下，他们会使用与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最匹配的证据形式，正如我们在第4.3节中所提及，并且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据和行动之间通常不是一条直线（例如，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相关的证据，有的证据也可能质量很低或对其环境的适用性有限，并且可能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决策者也可能使用其他形式的证据，例如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经验性证据和法庭上被考虑的司法证据。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还需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例如，政府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制度上的限制（包括资源限制）、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自己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公民的价值观等因素。我们的重点是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者、专业人士和公民这四类决策者在应对社会挑战时更好地利用证据（尤其是研究证据）和其他因素。

来自《纽约客》（The New Yorker）周刊的四个故事说明了这四种形式的决策者如何使用证据来学习和提高决策能力，以及他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提高其决策能力。



政府政策制定者, Mohamed Nasheed

第一位是马尔代夫前总统、现任立法机构发言人Mohamed Nasheed。他具有非常强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他的国家（印度洋的一个群岛）有朝一日将被完全淹没。Bill McKibben对他的一次采访中描述他在马尔代夫实施气候适应战略所做的努力，同时他也代表气候脆弱论坛的48个参与国家倡导重新调整其国家的债务结构，以腾出实施这些战略所需的资金。（4）Nasheed敏锐地意识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马尔代夫所面临严峻未来（或被称之为生存风险）的证据。他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来同时追求三个目标：1）说服高收入国家采取重大行动，减缓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通过他提议的债务重组；2）在他自己的国家建立气候韧性；3）为他可能无法实现前两个目标而做好准备，他的同胞们有朝一日将不得不离开这个被淹没的群岛。故事中未说明清楚的是他在哪里寻找他所考虑的气候适应战略的证据。



组织领导者, Alvaro Salas Chaves

第二位是Alvaro Salas Chaves，他是哥斯达黎加几家卫生组织的前任负责人。他创造了许多机会改善同胞的健康，从一家非常小的诊所工作开始，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领导该国的社会保障机构。这个故事的作者Atul Gawande描述Salas是如何逐步将卫生系统从一个卫生工作者对进入诊所和医院的患者做出“响应”（即治疗给他们带来的任何问题），转变为一个卫生工作者的团队对当地所有患者的健康负责。每个团队都被组织起来，积极主动地接触他们的患者（更频繁地接触那些有着最大健康和社会需求的人），并在每次接触中提供一系列有效的服务。（5）因此，哥斯达黎加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Salas拥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动机用以创造机会将这种新方法“制度化”。他似乎将这一点与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相结合。故事未说明清楚的是，他从哪里获得了关于团队需要提供有效服务的见解。但我们可以推测，认为他会接触到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其区域办事处（例如，泛美卫生组织）发布的许多指南。今天，他可以通过检索卫生系统证据数据库（HSE）来找到他所需的“人口健康管理”方法的证据，通过Cochrane图书馆寻找关于有效服务的证据以及通过WHO数据库来寻找指南。



专业人士, Denny Gioa

第三位是福特公司的前工程师Denny Gioa，他利用自己作为工程师的专业能力来解决汽车安全问题。他经常利用数据分析来决定何时建议他的公司投资数百万美元来召回某一型号和生产年份的汽车。这个故事的作者Malcolm Gladwell以一个关于牧师、医生和工程师的幽默故事开始，其寓意为工程师是唯一一个用自己的判断力来解决问题的人，尽管他可以如同牧师和医生所表现出的同理心一样表现。（6）Gioa的经历与此故事有些类似。他有能力、机会和动机使用数据分析和判断力将其用于解决建议召回哪些汽车型号的问题。然而，当公众发现这些公司明知一些罕见事件，如平托汽车在追尾碰撞中爆炸，却仍选择什么也不做时，他的严谨态度并不能阻止公众舆论，如对大型汽车公司的反对。如果我们真的想提高汽车的安全性，一种方法是确保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有能力、机会和动机使用相关问题的数据分析和解决该问题全部方法（包括安全带和限速）的最佳证据综合，以及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用以说服其他人需要尝试和评估新方法并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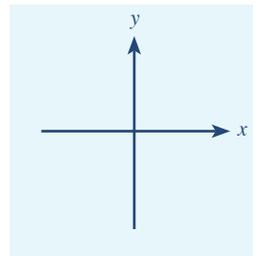


第四位是公民领袖Paula Kahumbu, 她利用自己作为生态学家和故事叙述者的双重身份, 致力于让她的同胞将自己视为生态保护工作的利益相关者。这个故事的作者Jon Lee Anderson描述了Kahumbu如何创造机会, 通过制作和主持一个受欢迎的肯尼亚电视节目——《野生动物勇士》(Wildlife Warriors), 让肯尼亚人成为行动的中心, 并在此节目中遇到致力于拯救濒危动物的公民。(7) (正如我们在第3.6节中所解释的, 我们使用“公民”一词是为了关注个人, 而不是暗示由政府确定的具有正式公民身份的人。) Kahumbu将她的同胞称为英雄、竞选支持者、植树者、公园和森林的维护者以及选民。为了支持自己讲述哪些故事以及采取哪些保护策略, 她使用了有关濒危物种和法院关于偷猎裁决的数据分析结果。她还“研究了在肯尼亚的对话中哪些是有效的, 哪些是无效的”。理想情况下, 她可以通过综合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证据来补充这些“本土”证据, 即哪些战略和战略组合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这些可能包括非常上游的战略(如人口规划)到中游战略(例如, 自然资源管理(例如, 维护公园、限制伐木、限制无序扩张和限制圈地等)、基础设施规划(例如, 仔细定位新的电线、铁路和公路的位置)、原住民社区支持(例如, 与保护团体和私人野生动物园公司达成双赢租赁协议)和野生动物保护(例如, 禁止偷猎和象牙销售))。

正如这些故事所说明的, 我们目前应对社会挑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依赖于长时间的临时学习。我们需要过渡到一种新的方法, 即系统透明地使用证据来快速学习和改善。COVID-19大流行表明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 我们了解到, 在政治、地理和流行病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可以将病毒清零作为目标, 正如澳大利亚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做的努力(然而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如Delta变异株的出现)
- 我们了解到气溶胶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 口罩和通风有助于防止传播(请参阅bit.ly/3HiGuIT)
- 我们了解到, 在小学和日托机构中, 当感染防控措施到位时, 儿童与儿童之间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传播风险较低(关于该主题的动态快速证据综合, 请参阅bit.ly/3c7B0r1)
- 我们了解到类固醇可以降低住院患者的死亡率(有关药物治疗的动态指南, 请参阅bit.ly/3DehxMf)
- 我们了解到疫苗可以预防传播、感染、严重疾病和死亡, 包括新型变异株(请参阅每两周更新一次的COVID-END动态证据综合#6, bit.ly/3FfP0eX)
- 我们了解到,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很严重,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最弱势群体, 如生活在长期照料中心的人以及面临经济和住房无保障的人。

突发事件指南(例如,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但在此期间要好好洗手)被标准指南(例如, 我们现有许多证据表明戴口罩可以减少传播)取代理所当然。上面的列表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也是应该的。



正如我们的一位委员在讨论中所提出的建议, 想象一个2*2的坐标轴, Y轴表示使用(或不使用)最佳证据, X轴表示能够(或不能够)依靠自我纠正系统来确保出现实践效果。委员们认为, 许多医生通常处于2*2坐标轴的

右上象限。他们使用严格制订的临床实践指南(最佳证据), 并且观察指南推荐的治疗是否对患者有效。后者可能经常是错误的, 但它有力地补充了前者。士兵们更普遍地沿着X轴向右偏移。他们不能像医生那样使用严格的评价, 但是他们会非常迅速地观察到他们是否完成目标。许多类型的决策者既不能借鉴其工作领域的最佳证据, 也不能依靠自我纠正系统。他们可能持有有效方法的信念, 有时其信念非常强烈, 但这些概念既没有经过严格的评价, 也不受已证明其高度可靠的自我纠正系统的影响。

《证据委员会报告》的前六章提供了支持证据委员会建议的背景、概念和共享词汇。这六章不仅可以为能够做出必要改变以确保持续使用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的人们使用，还可以供其他人使用。第七章提供了证据委员会关于我们如何能够且必须在日常和未来全球危机中改善证据使用的建议。

该报告包含52个小节，可分别从证据委员会的网站下载。部分章节的草案在证据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时刻公开，用以征求关于如何加强此部分的反馈意见并开始准备建立行动。这些部分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信息图表，易于在演示文稿、报告和其他格式中使用。证据委员会鼓励您“自由分享，标明出处，经许可改编”。

委员们和秘书处希望这份报告是一系列严肃对话的开始，讨论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非常迅速地开展了这项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失误，即遗漏关键的证据综合和其他文件。我们已涵盖了许多领域，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挑战，但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以偏概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我们尽可能避免每章几十页的参考文献清单，但也不可避免地未能向我们借鉴其观点的学者致谢。我们再次欢迎反馈意见，以便我们以及其他人在本报告的基础上创造的其它产品中进行修正。

本章的其他八个部分包括：

- [1.1 委员会的理想属性](#)
- [1.2 委员会成员](#)
- [1.3 委员会成员的职权范围](#)
- [1.4 委员会如何建立和完善过去的工作](#)
- [1.5 与COVID-END的关系](#)
- [1.6 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事件时间线](#)
- [1.7 公平性考虑](#)
- [1.8 成功实例](#)

公平性部分尤其关键，因为公平是贯穿整个报告的主线。

本报告的七个附录是对这些小节的重要补充：

- [8.1 支持委员审议和建议的方法（与\[第1.1节\]\(#\)有关）](#)
- [8.2 委员简介（与\[第1.2节\]\(#\)有关）](#)
- [8.3 秘书处（补充\[第1.2节\]\(#\)）](#)
- [8.4 资助者](#)
- [8.5 委员和秘书处的隶属单位和利益关系（与\[第1.2节\]\(#\)有关）](#)
- [8.6 顾问和其他致谢（补充\[第1.2节\]\(#\)）](#)
- [8.7 时间线（根据\[第1.6节\]\(#\)扩展）](#)